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九五期 ——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8f)

| | |
|------------------------------|-----|
| 【研究报告】七千人大会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 张素华 |
| 【往事追忆】毛泽东、周恩来如何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 范正美 |
| 【各抒己见】给邓榕的一封信 (第二部分) | 樊立勤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七千人大会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 张素华 •

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眼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每当人们谈到毛刘之间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少奇。

不过笔者发现，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经过人们简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么讲的？是这么具体直接吗？通过仔细查阅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发现毛泽东其实是这么说的：“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是真讲了这么一段话呢？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

幽默风趣，又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息，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

难道是毛泽东空穴来风？这不太可能！如果考虑1967年2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刘少奇已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用1967年的感受来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刘少奇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这至少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毛泽东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毛泽东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

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大会在讨论时，有些人认为评价低了，应统统改为“完全正确的”。后来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其他没有改动。“三面红旗”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期望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少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一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要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还有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刘少奇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刘少奇没有讲。“三面红旗”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如果是个别错误，就要考虑具体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全局性的错误，就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跃进”的失败，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对“三面红旗”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还要高举？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全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一直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刘少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然如其所说变得“难说”起来。刘少奇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三面红旗”时，是这样说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还是应该办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然后，他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还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

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1962年3月，刘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这些话都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毛泽东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尽管刘少奇讲的都是事实，或者可能讲的严重了一些；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反对盲目乐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讲过17条困难，但现在，毛泽东虽然也讲困难，却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刘少奇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毛泽东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吧？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

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 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

## 【往事追忆】

毛泽东、周恩来如何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 范正美 •

〔编者说明：本文摘自不久前出版的范正美回忆录《秋梦追思》。范正美在文革初期为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学生领袖，黑龙江省造反派于1967年一月夺权，范一度被推选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一号领导人，文革结束后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现为退休教授。本文讲述中共领导人如何要求他和其他学生领袖把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位置让给中央任命的干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决策人在“十六条”中承诺“巴黎公社式选举”之后六个月重新返回到原来的中央任命制的过程，对文革研究有参考价值。〕

斗转星移，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人们对于新生的革委会领导开始习惯，并且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秩序过渡，一批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成长，我们的自我感觉也不错。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一个毛孩子领导东北边陲之省是极不放心的。据当时传闻，毛泽东对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像蒯大富等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学生，曾经寄予过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是这些人阅历浅薄、独特的个性和善于思考的倾向，使他终于改变了初衷，他还是觉得，这些孩子毛手毛脚，不知深浅，只有他带出的老干部，才是信得过的。正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信息，打破了我的盲目乐观。

潘复生几次在革委会上谈到他昨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说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革命生产十分关切。到3月初，潘复生在一次革委会上又郑重地说：“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龙江的工作，他昨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汇报团到北京汇报工作。”

这件事潘复生事前并没有跟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我个别交谈，使我和其他造反派委员感到特别突然，但我们从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因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黑龙江人民的关怀，必将极大的推动黑龙江省的革命和生产。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很迟钝的，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幼稚的可笑。我在这时，一点也没有思考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信号。我的参谋不少，他们常常有什么事给我提个醒，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一个人向我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我和许多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以为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其负责人是在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两个通告也写得明明白白，以后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新的权力机构予以取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也就是说，我对于文革以后的政治体制转换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到北京之后，一开始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回想起来我感到自己见事迟、政治愚钝。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所以，当时我根据潘复生的传达，抓了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积极组织汇报团；二是准备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对于汇报团的组成，我们开会定了三条原则：首先是革命性，汇报团的成员，一定是最坚定的文革左派，他们忠于毛泽东思想，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其次是代表性，要有省革委成员，也要有基层各个方面的代表，军干群，工农商学兵都要有；三是年龄结构要合适，老中青三结合。

经过酝酿、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定了26人组成“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汇报团”，具体组成是工人代表5人，农民代表3人，解放军代表4人，学生代表5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2人，商业服务系统代表2人，文教方面代表2人，机关干部代表3人。其中中共党员17人（包括预备党员3人），非党员1名，其余为共青团员。

5名工厂代表是：北满钢厂工人李树森、哈尔滨发电厂工人姜凤珍、哈尔滨锅炉厂工人于庆彬、哈尔滨石油配件厂业余教员刘雪峰、哈尔滨伟建厂设计员孙宝生。当时就是这样，所谓工人，并非指的是第一线的产业工人，而是在工厂工作的人，都视为工人。这是当时的一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潮。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时尚，至今依然如故。读者到处可以联想这种情况。

3名农民代表是：依安县通宽公社社员宋淑芳（女）、肇州县双发公社社员许占义、望奎县先锋公社社员韩大风（女）。

4名解放军代表是：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双城县人武部政委王爱国、望奎县人武部政委范凤鸣、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张富。

5名学生代表是：范正美、哈尔滨体育学院学生王平武、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边士军、郭海（在省接管委员会工作）、黑龙江工学院学生聂景民。

2名革命领导干部是：潘复生和燕文卿。

2名商业服务业代表是：省外贸局一般干部毛远珍（女）、省水产局人事干部纪勇。

2名文教代表是：《黑龙江日报》见习记者李振盛、省电台朝语部编辑李德松。

3名机关干部代表是：省总工会研究员张林、肇州县副县长孙洁、哈尔滨市共青团市委一般干部刘宝民。

关于汇报的内容和分工，在哈尔滨我作了这样的安排：全省夺权情况——刘雪峰；三结合与干部政策——郭海；抓革命促生产——燕文卿；大专院校——聂景民；镇反情况——张富。此外，我还安排了关于典型汇报问题：哈尔滨市——王平武；北满钢厂——李树森；哈尔滨石油配件厂——刘雪峰；肇州——许占义、孙洁；望奎——范凤鸣；省市委机关——郭海；大专总部——聂景民、边士军。为了进一步发展省里的形势，我还归纳应该请示的问题有七大方面：党的组织恢复问题、地专领导机关设置、特区、林业总局和农垦总局设置；有关学生毕业及参加接管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问题；劳改农场归地方管理问题；森林警察建制（包括3000人员及其由省军区管理、次森林划给部分社队等）；大庆专题汇报问题；军工八八团后台以及省报纸和机器问题。我叙述这么多，不是说我当时安排得如何周详细致，而是想告诉读者，在我的生平里，这是我第一次悟性迟钝，我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汇报请示的根本问题应该是由潘复生、汪家道担任革委会的一二把手，而不应该是我刘雪峰。

我记得潘汪于3月9日坐飞机到达北京，我们其他成员是3月11日到达北京的。潘汪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在坐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我们这些人在北京等了五六天，3月16日晚饭之后，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我们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戚本禹这次找我们群众代表的本意是，要我们群众代表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但是他没有直接了当地说出，而是忽悠了一个大圈。

戚本禹这么开始他的谈话：“黑龙江省革命搞得很好，很早就想向你们学习，今天请你们来谈一下。”接着，他对着汇报团名单，一一认了一遍之后，又说：“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近几天有什么想法？”对于这句问话，我和刘雪峰互相对视了一下，感到很突然，想不出问者用意的真谛，于是我反问了一句：“戚本禹同志，您想了解我们哪方面情况？”戚本禹不采地说：“你们的情况从报纸见到了，潘复生同志汇报我也看了，在这个基础上找你们再谈谈。”

于是，我开始汇报，谈了一些情况之后，戚本禹忽然问道：“你们核心经常开会谁主持？就是主席说的你们弹钢琴的班长是谁？”当大家指着我说，“范正美是班长，刘雪峰是副班长。”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狄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你们把正副班长交给他俩，我想你们不会有意见吧。革命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嘛。潘复生的意见正确就按着他的干，不能认为当班长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员就是阿斗，那么群众就更是阿斗了。这种说法不正确。游兴懋挑拨，你们没有上当，这很好。当班长是为人民服务的。谁来当班长，谁来弹钢琴呢？必须是有领导经验的。让潘复生来做班长，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你们可以提议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做决定。你们说，这事他本人不好提。你们做个委员，把

你们报为班长，而让潘复生做个委员，中央不好批啊。论权威，你们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但是从全局看，特别是在干部中和军队中你们的威信是不如潘复生和汪家道。你们可以做个委员嘛。他们要向你们学习，但你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恐怕就更多些。上海、山西、山东等地已经批了。上海是姚文元，山西是刘格平，山东是王效禹……这次你们来主要不是为了得到中央的正式批准和承认吗。过去中央知道黑龙江省有问题，才派潘复生去的，结果那里勾结得严严的。潘复生受到排挤。现在，潘复生和你们造了反，你们得让他真正当书记。要革命就彻底革命嘛。”

说到这里，戚本禹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首先表态完全拥护潘复生、汪家道当正副班长，我个人的安排完全听从组织和群众的安排，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要求。我说完之后，刘雪峰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其他群众代表没说什么，戚本禹就起身与我们告别。

第二天，我在住所召集了汇报团全体大会，汇报了昨晚戚本禹代表中央接见群众代表的情况，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潘复生和汪家道在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精神，并表示服从中央安排，要向小将学习。我问潘复生应该怎么办？他要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家里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明知道，这是走过场，但我还是按潘复生的指示，给张万春同志（离开哈市时，指定由他主持工作）打了电话。在我写这段回忆录时，翻看了我的笔记，是这么说的：

“根据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我省革命委员会班长、副班长应该由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担任，我们来京的同志和潘、汪一起研究，完全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决定由潘、汪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并改称主任、副主任。委员会设51人，常委19人，具体人选回家一并研究定。现征求你们的意见，上报中央批准。如无异议，可以不来电话。如有不同意见请来电话通知。建议立即召开全体委员开会。”

记得过了两天，潘、汪打电话，用车把我接到京西宾馆他们的住地。潘复生、汪家道亲切接见了。告诉我，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个报告，由他们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我不知道如何写，就由潘复生口述。报告用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白信笺这样写道：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范正美 1967年3月18日

至此，我的班长之职就卸任了。历时50天。

3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指我写的报告）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之后，周恩来还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体有这么几点，我在这里也是复录当时的记录：

关于运动发展，周恩来说：“初期，学生起了很大作用，初期有丰功伟绩，破旧立新也好，



大串联也好，都有很大功劳。去年10月以后，林彪同志号召开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学生从北京到各地，也是学生到工厂、到机关推动了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运动、前进，反动路线要反扑，搞经济主义，是新形式。他们钻进来假夺权，这对我们认识到要夺权了，工人阶级就当先锋，上海工人阶级打响了第一炮，由很少人，发展到群众运动，由几千人发展到上百万人上了街夺权了。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反动路线进行了反扑。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形象化点说：展开了全面内战。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年一月，‘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连锁反应，夺权斗争，闻风而起。光学生造反派还是不行的，仅工人也不行，还要革命干部，要大联合。”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夺所有犯了一般错误干部的权。只要彻底改造，不是反动的，不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吸收三结合。一个地区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慎重，要是不慎重，就复辟了。没亮相的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坚决的，群众通不过的，不能参加结合。三结合，不是凡是领导就结合进来，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需要革命干部参加领导，但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出来支持，必须讲究三结合。军队支持夺权才能站住。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广大群众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骨干。”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周恩来说：“过去刘邓路线是一律打倒，在干部路线上还没肃清。打倒一切的流毒，还是从刘邓那里来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到一个学校，干部一律靠边站。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说了吗？打倒一切是形‘左’实右。他们六四年‘四清’搞人海战术，让干部一律靠边站。这个思想‘四清’时就有了，现在又复活了。”

关于反倾向问题，周恩来说：“既不能打倒一切，又不能让原班人马复辟。”“一种是没有阶级分析，一律让回来。有的人反动路线还发展，搞什么赤卫队，经济主义，这就是保自己。这样的情况要分析。有的人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就不能结合。”“领导干部三结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搞两条路线斗争。”

关于李范五、欧阳钦问题，周恩来说：“现在的黑龙江省从省里造反的也是比较多的，搞一些阴谋的是李范五，欧阳钦是底子。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党中央，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独立王国。”

关于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汪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十七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一个方面。黑龙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些，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查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查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查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关于党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

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这次汇报，事先我都作了周密布置，大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宣布“现在请你们汇报”，而是一个个问我们的姓名、在哪个单位、干什么的，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等等。原先我们都感到比较紧张，这样一问一答，大家就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进入总理要谈的正题，而我们原来要说的主要事情也就谈清楚了。我为总理的谈话艺术、不倦的工作作风和亲切诲人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总理的谈话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像长辈唠家常一样，把他那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应该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如行云流水般表述出来，没有任何做作和装腔作势的地方。上述几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的谈话记录顺下来的，并非刻意整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没想到，总理此后就记住了我。遗憾的是，我因为激动，竟没有请求总理同我们一起留影纪念。会后，大家把我好一顿埋怨，后悔终生。

全体受到接见之后，临别时，总理又对我和潘汪交了几句话。一是“调欧阳钦到北京接受审查”；二是“李力安是安子文安排去的黑龙江现在已经明确了。”

周恩来讲完之后，一个个征求其他领导人讲话。只有康生讲了几句。他说：“要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嘛。在这方面，你们黑龙江省还要加强。要向上海学习。我看你们黑龙江的文章太少。”周恩来又补充说：“对啊，你们还要多写些好文章，希望在报纸上，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这就是黑龙江省汇报团3月去京的始末。

我在从京西宾馆回汇报团住地的车上想，我区区一个普通大学生，28周岁，被群众组织推出，当一个省的最高领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堪胜任。在哈尔滨已有深的感触，到北京不几天，更是感到力不从心，经验不够，疲于应付，差不多天天都有张万春的电话请示：有全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问题，煤炭生产和供应问题，大庆石油生产问题，春耕生产问题，出口车皮问题，粮食厅关于稻种问题，还有外事——阿尔巴尼亚大使访哈问题，干部解放和结合问题，建工学院造反团问题，等等，要我拿主意、出对策，或要求请示中央，我都一一作了答复（这些答复后来没有听说怪罪我的）。

那几天，汇报团其他成员都是那样轻松愉快，而我却忙着记笔记、做记录、草拟文稿，大事小情，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吃饭都有电话来接。现在我可解放了，不用我去操心了，真是如释重负，有一种解放感、自由感。后来有人问我：“你不担任班长了，有何想法？”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上来的，也没有想在这个位置上长期呆下去。革委会的一号通告说的十分明白：革委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我只不过当了一段临时工。”说实在的，不但我是这么想的，当时许多造反派也是这么想的。

□ 摘自《秋梦追思》，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年2月第1版

~~~~~

【各抒己见】

给邓榕的一封信（第二部分）

• 樊立勤 •

毛毛小姐：

我想就您文章中涉及或没涉及的一些问题和您逐项探讨一下。

1、您文章没有更多地谈及刘少奇问题，不知是忽略了还是有意回避。

我希望有一天，就刘邓的关系问题看到您的文章，听到您的见解。

毛为什么打倒刘邓路线，就那么几次会，就会令毛痛下决心，批刘又批邓。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如下论点：“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总的方面讲，刘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持保留态度。

这个话是反高饶联盟时讲的，从政治斗争来讲，无可非议。邓小平的立场应给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历史判定，这令人难以心服。后来我记得邓在别处还讲过类似的话，应该说，这就是邓发自内心的一种认识了。

这就令人十分费解了。

起码两个人有不同的见解，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只是他们不说。

我相信毛泽东心中一定这么想：“他的地位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还用你说。”

周恩来一定会想：“历史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刘论资格和功劳不但不能和毛周相提并论，也比邓小平相差甚远。邓小平不但参加“八七”会议，而且当时就是秘书长了，后又挑大梁搞了“百色起义”在中央苏区受排挤。但长征过后，成了一方主帅，主持全盘工作。解放战争有临危受命“挺进大别山”一招险棋取胜，改变了战略格局。

刘少奇不但没参加重要的“八七”会议，而且六大时还不是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这一升格，国际因素多于国内因素，不能认为是凭本事上来的。在这一点上与毛周邓及其他人不同，而这时，这个“委员”也不算什么，“八七”会议让毛进政治局，毛说自己不能进，要搞起义去呢。显然这是空的。刘少奇以这种地位，七大一下子成为党的五大书记之一，党的领导的实际的第二把手，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历史上形成的，简单地说就是有人为因素，也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需要。我认为这不用看任何内部资料，只要把毛选、刘选、周选从头看一遍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刘的地位问题当时就有争议，有人对六大提出非议，周恩来作了有力的反驳，见周恩来“六大研究”疑问。

历史上的旧账也就不用了，问题是建国以后，毛几次往出抬邓，根据我所看的资料，我还没见毛对任何一个人——包括林彪也没像对邓那样讲这么多好话。

1956年8、9月间的7届7中全会，作为“八大的预备会”毛当即提出邓为总书记。

毛在会上高兴地表示要为邓“宣传宣传”，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又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八届一中全会，邓成为常委、“总书记”。

而此时，毛对刘的评价就非常一般了。请看，同时在八大预备会上说的话，毛说：“恩来、陈云和小平同志是少壮派，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半个）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没有资格登台演主角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个作用。”毛泽东讲话当然有信口说的时候，这里就有，明明周比刘还大一岁，倒算少壮派、刘小一岁反而该下来，但还是可以看出毛的倾向。

在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的就更坦率了：“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一正一副。”然后转身对邓小平，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握，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啊。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刘少奇刚当了第一副主席，这不等于公开把刘晾在了那里，我相信当时最不爱听这些话的是刘少奇和林彪。但此时，毛绝没有重用林彪的意思，晾一下刘是明显的。

我的判断：毛要换接班人为邓小平确定无疑。

我们这么反应慢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精明过人的邓小平意识不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刘更会比谁都敏感。

后来，有了时机刘就做出反应——这是登报见标准像的事。宣传部要把刘的照片与毛并列登出，上报到总理处，周批示认为这么做不合适。刘坚持要登，应该说，周的态度是正确的，既是对刘的爱护，又是对邓的支持。

标准像只是一个形式，它后面隐藏的内容是极为深厚和丰富的。与毛并列挂标准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绝对不是小问题，对这一点周的认识是老到和深刻的。

这一行动表明，刘不接受毛的安排，坚持不让步，不但不让出接班人的位置，而且立刻就决定分庭抗礼。这当然是自不量力。

如果刘退后一步，听从毛的新的安排，与周共同支持邓为接班人，那毛很难再反悔，另立新人。而这样，更便于刘毛之间交换意见，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于国家大局有利，于自己亦有利无害。但刘少奇就是刘少奇，他没有这个政治家的风度和眼光，他决定一争高下。这就是刘极不明智之处，他的不幸有相当大的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

毛为什么冷淡刘呢？

毛刘的政治分歧是一种原因，但毛、刘的感情裂痕早就有了。我认为最早可能产生于“陕北分家”——即毛、周、任、彭、陆留陕北，刘、朱去河北，设“工作委员会”。毛周之间的历史宿怨从重庆谈判到陕北转战时得到弥合，而毛、刘隔阂出现了。

是不是这样呢？

令人不解的是，毛的1959年讲话以后，邓与毛应该更多地交换意见，便于相互沟通，按毛的说法，不知为什么反而疏远了。

难道真是因为此时也启用了林彪，毛做了林的工作，刘做了邓的工作，政治歧见公开，也

许是这样。

但是可以判定1959年时以至庐山会议开过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林在毛的心目中绝对没有邓在毛心目中的地位，更没有选林为接班人的意思。这有对他军事力量的提防，也有对他政治上治国能力的疑虑——因为林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而毛又是极为看重实践才能的。实际上，即使林正式成为接班人，毛对这两点也是不放心的，更不用说1959年了。毛对邓的治国才能完全信任，周恩来对邓也极为欣赏——薄一波的谈话可证明这一点。如果启用林是影响毛、邓之间交换意见的原因，那么后来就主要是政治分歧了。根据罗点点写出的情况：早在1962年毛就向罗瑞卿交了底，不过他可能没有向邓透露，也没向外界透露。

在对林军事力量的提防上，毛、周是非常一致的，这是由林彪的力量决定的，熟读历史的毛永远也不会忘记，对此周恩来对毛是极了解的。他虽然平时不说，但他对中国经、史、子、集的熟知决不次于毛：这可以通过周的“书信选”看出来。毛、周的“书信选”我每本读了两遍，我对周的古文功底印象极深，深厚异常。所以周的见解会与毛完全相同。他相信毛对林永远也不会放心。即使毛一时冲动，关键时刻，周只要一点，毛就会警觉，这可以从以后林的垮台中看出来。

邓在此时是否与周交换观点过少呢？我们不得而知。

最了解毛的是周，最了解刘的也是周，最了解邓的也是周；应该说，周、邓的思想更接近，感情也更接近。但竟成了“刘邓路线”真让人不可思议。

周不能过多地找邓，周知道在政治上毛对邓比自己更信任。毛认为周是一贯的右，同时也知道周在党内外极有人望和相当大的潜在势力，毛对这一点是心中有数，也是警惕的：因此周也心知肚明。所以，周主动找邓对邓不利，就如同刘找邓对邓不利一样。周只能对毛一人负责。

对中国的政治奥秘周恩来理解得十分透彻。

另外，刘、邓的为人也截然不同，我听到对刘的公开评价如下：

黄克诚的儿子黄煦说：“老干部都认为刘少奇拉帮结派。”

叶挺的儿子、女婿提到刘少奇，更是破口大骂：“事情都是他搞坏的。”

邓小平对此不会没有觉察吧。

朴方在最危难时讲：“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刘邓路线的提法，刘邓不和人所共知，怎么说是刘邓路线呢？”这是朴方当时提出的应有的抗议和有力的抗争。

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朴方说的这句话，也不懂这句话的含义，随着资料的不断地披露，对党内斗争不断深入地了解，我认为朴方的质问是对的。朴方问的是对的，这也是我今天的提问：请毛毛小姐研究一下，在将来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给以回答和澄清。

刘少奇的地位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我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也会带来后果，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中共的历史上，先不论是非曲直，正确与错误，仅就受处分、遭打击，最多的应属毛、周、邓三人，而其中周恩来是犯错误最大、受处分最多，作检查也最多；邓小平是受打击最为严重、最惨烈、也最悲壮的一个。

相比之下，刘少奇受处分最少的，尤其是建国以前，几乎没受什么处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一贯正确，我看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明他做事情少，或者说，他没处于主要领导位置，不是独当一面的任务。在中国与共产国际这么复杂的关系背景下，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如此曲折、艰难、困苦的过程，既要找到正确的道路，又要应付好方方面面，婆婆太多，上面的标准有一人一个样，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果身在第一线，做具体工作，不犯错误、不被处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刘少奇的清白，只能说明他的经历简单，磨难不够，资格不够。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十分牵强的，这是历史决议，但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这种决议正如任何决议一样，他只是反映当时主要主持人的意志，主要是当时开会时的力量对比，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意见结果。我确信当时党内也是许多人心中不服的。不用说周恩来，就是陈赓、李克农也不会服。钱壮飞如果在世，也会不服，后起之秀熊向辉也不会认可。刘少奇处理顺直省委的事情就很说明问题，他是既不能服众，又不能正确解决问题，那又怎么成为白区的正确代表，这只能说是毛刘之间的一种结合，毛的一种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

毛、周、邓受打击、遭处分和不公正待遇最多，但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心中尽管不满，一肚子火，但绝对服从决议。一成决议，不争不辩，让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大事能干，小事也能干，而且干就干好，从客观上说，是一种等着瞧，让时间去做裁决的态度，给大家以时间，给人民以时间。相信人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主观上确实表现出一种党性和超人一等的胸怀，不计名利，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而能有这种态度和立场，就不仅仅是个人态度和修养问题，更主要是他们的阅历、见识和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关，这是需要有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他们知道事情的发展变化是要时间的，人的观念的改变也要时间，这是等待是必要的、应该的。

刘几十年受到的最沉重打击就是1966年这一次，我相信，最初毛并未想置刘于死地，这从刘靠边以后，毛对它的态度可以看出来。1966年11月10日内在天安门毛主动与刘交谈了长达10分钟，这显然是毛有意做给所有人看的，我认为这就是毛当时对刘的基本态度。但是到了1967年1月13日毛约刘再次谈话以后，毛的态度就变化了。

先不论毛的政治见解和观点对不对，但可以肯定，毛的这一次态度是认真的。但就是在这次谈话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回家务农的要求，这就等于向毛进行了最后的摊牌。也就是说，刘的态度为：要么我仍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按序接班，要么就什么都不干。这就是刘给毛的信息。刘也许此时仍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毛也莫奈我何：可他忘了，毛认为自己是创造历史的，也是可以改变历史的，这就使毛向作出最严厉的决定由迈出了一步。而这种结果是与人民群众无关的。只是邓小平和其他人受了无辜的牵连。出于如此高位的领导人，当他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是不能主观的以一己之愿来行事的。我认为刘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是既无群众基础又无实际力量支持的。

当然从经济上说，刘邓在56—66年的主张是对的，切合中国实情的，是与今日改革开放的政策相一致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是刘邓遭批判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老百姓才知道的，对运动的掀起已经无关了。

从现在公布的可以看到的材料来看，中国共产党认真地想摆正领袖与党、即毛与中央的关系是在1956年的“八大”上，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和邓小平起了主要作用，也得到老一

辈革命家的支持，但是这种精神并没有广泛、深入地宣传与全党，党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共产党对毛的宣传从1949年到1966年是完全一致的；调子更高，叫得更响。

在军内变化早一些，但是在社会上除了毛泽东就是刘少奇“论党”中的一些东西，所有的宣传材料、党史教育，全是以刘少奇“论党”的调子为基础。

而“论党”对毛的抬举与推崇是无以复加的。后来林彪的说法只是更加怪异和离奇，但并没有超过刘的水平，林彪的宣传在知识分子当中影响不大。我这里写出的观点是不少知识分子的看法，而我认为刘少奇的“论党”，不仅向全党宣扬了一部抽象、简单、神话了的党史和一种观念；而且宣扬了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想方法——绝对的、唯一的、单线条的思维模式。

这就是1949年到1966年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思维定势。它是如此坚固，1956年的“八大”决议对老百姓毫无影响。

当时对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的言论一无所知。文化大革命前以我为例，所知道的邓小平唯一一次讲话，就是1964年前后“为了照顾同学们的身体，改善伙食，增加同学们的生活费。”记得当时我说：“这个主意不错，往后可以吃得好点。”结果，我的说法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遭到了批判。文革当中我遭打击时又被上纲为吹捧邓小平。

对于陈毅，除了公开的外交政策的讲话，别的也一无所知，批判陈毅时除了他的黑话集，人家都是第一次听说，可一下子就更喜欢陈老总这个人了；在开放的气氛中，人的精神就会自然地伸展，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所以特别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对认识中国问题的症结和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有着重要意义。

毛泽东是与世隔绝的，后来又与老干部隔绝；中央与基层、党内与党外也是隔绝的；群众的思想受到单一灌输，这就是文革发生时中国的现实社会。

从根本上说，毛与党内老干部一次次发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就是毛的长期封闭状态，脱离实际，而只从教条、空想来治国。如果早就上下沟通，就绝对没有毛泽东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有他“想也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

下层的人民是在一无所知的状况下生活的，又这样被驱使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列车，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上面写出的那么一点东西，那么几句话。这一切，就是根据刘少奇的书，多年教育的结果、驯服的结果。

文化革命发生了，当党内斗争对刘不利了，做出了使他个人难堪的处理，他一下子摊了牌，老百姓怎么理解、怎么选择。

我可以说，不仅老百姓不知道，当时连周恩来、邓小平也不见得知道毛刘谈话的全部内容，既然中国共产党一向听毛泽东的话，不听怎么办。听毛泽东的话错了，不听更错。老百姓总是错，到底错在哪里。这就是刘少奇当时没有群众基础的根本原因。这一切他是有责任的。

刘少奇参与主导造出个神，当对自己不利时，又一下不承认了这个神，群众怎么理解，要么说明刘对毛原来的宣传就不真是和缺乏诚意，要么说明此时，他不识时务，他不具备与毛摊

牌的实力和资格，二者必居其一，而他强行这么做了。这时，刘的进一步不幸就是不可避免的呢。

事情到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即中央碰头会，事情就进一步剧烈化了。

本来事情可能向另一种态势发展。

毛此时的心态是平和的。

据今天所有可以见到的资料记载，都是毛极有兴趣地听取几位老师和副总理的意见，特别听到谭老板夹起皮包要走，陈毅追上去一下揪住谭老板，说：“别走，别走，咱们还得留在党内作斗争呢。”毛泽东听得都笑了。

以毛的胸怀和阅历，这种场面这些话他实在见得太多了，实在算不了什么；跟他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几位老同志即使骂翻了天，他也是容得下的。

但是后来听到陈毅把延安整风的事情也掀出来，而且对周说：“总理，你那时不也是挨整的吗。”特别是陈又进一步说：“主席那时威信也并不高，也没什么吗。”

听到这里毛一下子变了脸，把手一拍沙发说“陈毅，你要干什么！恩来，去找他谈谈。”

不过这两句陈毅的谈话当时没有向下传达。

碰头会从此取消，形势进一步激化。

陈老总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说，真无可挑剔。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人见人爱。但作为政治家来说，真差把火。

这一下子，毛在中央干部中给搞得里外不是人，周的地位更加被动，更难于讲话了。对林彪、康生和中央文革一批人更加有利。

我认为，此后变化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可以确定的有如下几点：

（1）毛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渐渐下定；

（2）毛从此时开始，深深后悔把刘与邓硬给扯在一起——派工作组的事，实在也不算什么大事。他知道，只有邓不会翻这些旧账，更认为邓比这些人成熟。

（3）周在内部批评陈的冒失以后，每天应付对陈毅的揪斗，陈毅在哪里挨批，周就跟到哪里，实际上是坐着陪斗，考虑别的事的精力更少了。其他老师的发言权进一步遭到削弱。

（4）全国进一步大规模的批人整人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全国打“二流派”。我就是在这时又被打成“二流派”的，几次揪上斗鬼台的。

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事情一直到1967年武汉的7·20事件，才使毛再一次清醒，全面调整政策，毛与林的矛盾冲突公开了。

但是，从根本上说毛的封闭状态并不是从建国以后进入中南海开始的。我认为，一到陕北抗战一开始，他就有一半处于这种状态了。因为这时，顶在第一线的已经不是他了，而是在太行山、冀中、山东、东北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荣桓、陈毅、粟裕这些人了。

下边的艰难，他只能听说，而缺乏在一线的亲身体会：解放以后，二野、三野的干部对人事安排不满意，就有人为毛泽东对下边的艰苦奋斗无知的情绪包含其中。只不过，这时他还能听别人说，能听到老百姓的骂就是了。近了城以后，这都听不到了；悲剧的种子早就埋下了。

在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据说当时持反对态度的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林伯渠等人。

北大历史系的朱学文讲，康生在清华读书的侄子说，康生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别的事我也不替康生辩护，但是江青和主席结婚，康生是反对的，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面对反对的人，贺龙一下子把枪掏了出来，猛地往桌上一拍，说：‘这么大个主席，个把女人算什么。’这一下大家都不讲话了。”谁也知道贺龙的举动意味着什么，讨论到此结束，贺龙胜利了。

我也并不是为康生讲好话，但是，一个人一旦被打倒，就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的身上的做法绝对不可取，实事求是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民主的破坏在党内是由来已久的。

2、对罗瑞卿的评价：

邓家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讲别人不好听的话，不讲坏话，我和朴方接触这么多年的体会就是这样。而且朴方从不讲不文明的话，从不骂人，讲话这么多年，不管多么困难、艰辛，从不说话带一个脏字，有着极好的家教和做人准则。

毛毛小姐的书，也反映出这一特点。

这是为人准则，但写政治、写历史，这样就略显不足了。

或许毛毛小姐不知道，或许知道不愿深谈，但我了解的罗瑞卿与您说的不一样。

至少毛毛小姐对罗瑞卿的评价和罗点点的评价在对林彪问题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罗点点以女儿的身份和权威性的语言对罗瑞卿给以严厉的批评。罗点点质问罗瑞卿：“你不认为在林彪这个问题上你也是负有责任的吗？”

罗瑞卿坐在轮椅上，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才对来访的老朋友讲：“包括我们这些受过迫害的人，都应该好好想想，国家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要不然我们的孩子都不答应了。”

罗点点这样问，一定是通过多年的生活和知道许多罗瑞卿与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事，和罗在其中的作用，才会这么问的。

罗点点写出了一件极有说服力、极有分量的罗瑞卿为林彪讲好话，为林彪贴金的话。而这话是罗讲给毛泽东的。

事情是有关第四次反围剿的。罗告诉毛，第四次反围剿所以胜利，是因为林彪当时没听中央的指挥，自行处置，才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罗不但为林在毛这里贴了金，还在毛与其他人之间造成了嫌隙。

这是毛最敏感的问题，毛听了一定会对林彪更加赏识，一定认为林与自己最贴心。

到1960年代，反围剿过去都快30年了，罗瑞卿重提此事，可谓用心良苦。

毛毛小姐写道：“运动一开始，朴方就断定搞邓是为了给林彪让路，如果此论正确的话——我认为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断言，文革前为了使林彪地位上升，罗瑞卿为林彪作了不少工作。”

由于罗瑞卿的特殊地位，在毛泽东那里讲话有着极重要的作用，所以，罗点点认为，他对林上台有着重要责任是有道理的。

我相信罗点点还有更重要的事可谈，但写到此处也就足够了。

如果邓、林二者必择其一，应该说罗瑞卿一度是站在林彪一边的，我认为罗点点就是这么看的。后来，只是因为更加复杂的原因，罗和林冲突起来了，但这与邓小平的事情无关。与林彪冲突，不等于他就支持邓小平。

至少彭德怀是极不信任罗瑞卿的，彭德怀讲：“人家有不满意毛泽东的话，罗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到，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信。”可见成见之深。

我认为彭德怀的这种见解不是没有根据的，除了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罗瑞卿对彭德怀的过头批判以外，还有别的原因。罗瑞卿是参加百团大战而后又与康生等人一起带头否定百团大战的人，或者说是帮助毛泽东否定百团大战的人。

关于罗瑞卿其人，不好用一句话来简单的评价，当他失势后，他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见毛主席和林彪，他相信自己能把一切解释清楚。周回答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据说，周说话时很激动。

我认为周的回答既是批评又是规劝，也可看成一个评价。罗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认识政治问题，他的阅历不够。

他对政治、革命和权力斗争理解都过于简单、直观和单线条。思想限于刘少奇对革命道路的描绘圈中，而又困于这一狭小范围，不能自拔。

在对领袖、政党、国家、革命的关系的认识上不够科学，一切唯毛泽东之命是从，以毛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在不少方面迎合了毛泽东，体现了毛的态度，因此造成盛气凌人和以势压人的政治结果不止一起，这在他得势时，是不以为然的，但在他失势时，将成为一种不小的压力。

毛最看中的还是井冈山、中央苏区、特别是一军团的人，罗瑞卿明白这一点，助长这一点，并以身为一军团的主将而骄傲。他对林彪的支持应是必然的态度，应认识，但对此不应该苛求，这种单一的理解和态度，就使当林与罗冲突之后，罗陷入孤立，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罗瑞卿说：“一直到我坐到林彪的班房里，我还在想，这是林彪对我的误会。”可见其对林彪的信任之深，认识之浅。

最后纵身一跳，以死明志，应是罗瑞卿当时唯一的选择和应有的态度。以此表达对革命的立场，是大英雄之举，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以往的一切失误和过失业就以这种方式纠正了。

当他长时间倾向并支持林彪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对促成和加强林彪的地位，起过重大

的、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历时是这么写的，罗点点的书就记下了这么浓重的几笔。罗点点像她的父亲一样很了不起。

探讨历史问题，例如推论毛确认：“刘邓路线”，要考虑各种因素，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写史与处世是不同的。

如果邓在文革前，对罗的这种态度没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是要吃亏的。周对罗是有足够的警惕性的，因为周的任何意见罗也是不听的，这也怪不得罗瑞卿，因为，罗的心里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使罗瑞卿一人身兼七职，这是极不寻常的，对罗的信任之深，罗在毛处讲话分量之重，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他起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3、关于汪东兴：

汪东兴其人，我对他的看法比一般人，也比毛毛小姐写出的要坏的多。汪东兴、张耀祠、王连龙这三个人在罗瑞卿之后，毛远新之前，除迟群、谢静宜之外，是毛最信任的三个人，尤其是汪东兴和张耀祠。

汪、张、王三人之中，我只和王连龙打过交道，王连龙对我也印象深刻。现在他已经瘫痪在床了，对我仍念念不忘，令采访他的人大为惊讶：“他怎么会认识樊立勤呢？”探访的人心想，然后来问我。

汪、张、王均属于四人帮的思想体系。但王连龙在三人中是最温和的，作风也是最好的。只是思想狭隘，左。但我可以断定汪东兴帮助四人帮和林彪干的坏事，比一般人知道的多得多，封锁毛泽东的信息来源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让他办的事他打了折扣，能多干的好事一件也没干，

刘邓的事是毛亲手抓的，其他一切人包括周恩来都不能过问：这是他的事业，也是一块心病。他把具体处理这件事的权利都交给汪东兴了。我认为毛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处理是宽的。特别是对于邓，汪对邓家没有宽待，甚至也达不到毛泽东认可的程度，周恩来不过问刘邓的事，并不是绝对的不问，只是看看有没有时机。但决定邓家南迁的时候，周就亲自过问了此事，并且亲自打电话进行了安排。

我确信，在此之前毛周有一次长谈，其中一定重点谈了邓的人事安排问题。两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共识，或者毛听了周的建议，或者周得到毛的指示，否则精明而又谨慎的周恩来决不会亲自打电话到南昌，而且是打给林彪的死党。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就为了对程世清起到镇慑作用，唯恐出现意外。据 8 3 4 1 部队一位同志对我讲，当时毛主席有明确指示，中央有明确规定，周的一切行动必须事先向毛请示和请假，而其他一切人包括林彪和江青的等人的活动必须向周报告和请假，一直到林当了唯一的副主席仍是这样。这可以通过外逃前的叶群电话看出来。江青要见主席必须通过周恩来，江青多次要见主席都被周恩来挡住了，说“主席身体不好，没时间。”据她说，她亲眼看见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拦住总理。大吵大闹、又哭又叫要见主席，但周不为所动，就是不让见。她说，你们别看周在外边怎么讲，怎么怎么支持江青，那是给主席、给人家听的，动起真的他给江等人一点也不帮忙，一步不让。江青恨周不比恨邓差。

所以周往南昌打电话，林的势力也一定体会到这肯定是毛的意思，这是程世清等人所以也不得不小心的原因。毛周之间谈话为邓家确定的条件一定要宽松得多，让汪来执行，而汪实际

上是苛刻的，只是最低限度地使用了这一权利，给以了最小的空间。我认为，这可以从毛死后汪的态度中看出来，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约束，一切权力尽在他的手中，他是可以有所表现的（如果他是一位心有所属的人），而他对邓是相当严酷的，他想投靠华国锋，维持原来的或者更高的地位，压下邓的复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极有顾虑的；他知他对邓家并不好，他内心有愧，他害怕。

所以对汪是不应心存感激的。

实际上对汪的处理应该严厉得多，他后来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张耀祠也是如此，看一看他写的回忆录就可一望而知，前后删改了11次之多，就写出那么一点鬼东西，其遮遮掩掩就可见一斑了。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在海外发表攻击、丑化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出在8341绝非偶然，他的出走与此二人有直接关系，他们是难辞其咎的。十几年在一起还不知道李是什么人，汪东兴是干什么吃的。

李志绥的回忆录是极不可信的，只要看一看帮他定稿的人就可以知道，其中的主要人物石文安我认识，这个女人是哈佛毕业的博士，我讲过：“许多美国的所谓‘中国通’对中国是一窍不通。”就包括她。李志绥的文章之粗俗、见识之浅薄、用词之险恶，就反映出她的水平和心态。这些东西是美国味儿的“中国政评”而不是中国政治的真实写照。他们肆意丑化中国领导人，以此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涣散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他们只能写出恶意中伤中国的东西，欺骗对中国无知和幼稚的外界人士和年轻人，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李志绥及其儿子是有意迎合美国的政治需要的，他们在外电的讲话我听了，其人品品质之恶劣、为人之低级，只听一次讲话就可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心地狭隘又凶险的人。

对汪东兴其人和这支势力，我还想多说几句，我认为对其从宽和善待处理是一回事，对其起的恶劣作用和认识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他们仍保留着充分的发言权和毛的活动的独家评判权，而我认为他们讲的话是不足为信的。毛身边的人，只有李银桥、田家英和林克等人写出的东西有更大的可信性。

毛晚年的错误汪东兴和这支势力都是有份的，或者就是重要的参与者：这一时期至少可以从罗瑞卿失势算起，或许这也和汪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汪此时是毛最信任的人，而且是与毛接触的机会最多。

毛如果是一个原子核，汪的势力就是最内层电子。这一优势连江青、林彪都无法企及，而毛对汪的依赖越到后来越大，汪的权利也就越重。

毛为了平衡制约各派势力，便于监督管理实现大权独揽，也为自己身体条件所限，建立了一套极为特殊的政权体系。

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握有军权，位置在周之上，但活动需向周报告请假；周握行政权力，外事权力，但毕竟位置在林之下，另有合法的优先发言权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以对周掣肘和制约；老干部未失势的手中握有权力，但毕竟各管一摊；中央文革四处插手，扩大实力，但并没有真正握有重权，军内的文革是林彪搞的，有时利用中央文革共同整人，罪恶大多数是此时造成的。

这各种势力均在毛的控制监督之下，而这一点是通过汪东兴的势力来实现的。包括中南海的运动和对刘、邓、陶的揪斗，不但是汪东兴控制的，而且就是他主持和安排的。

北京的重要人物和北京的重要监狱是由毛泽东直接掌握的公安部控制的；而这一点主要是通过汪东兴、谢富治来实现的。监狱的待遇、好坏、狱外的安危和活动情况都是汪东兴决定的，情况也是由他提供的，否则外人怎么知道。整人、斗人、死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期间，汪东兴是集当年杨尚昆和罗瑞卿权力于一身的，甚至比那时两人的权力还要大还要厉害。汪东兴、张耀祠、王连龙、迟群、谢敬宜应属文革的第二支势力。

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相信汪东兴没起好作用，这支势力要占有对毛泽东的独家垄断和控制权；除了周恩来本人是汪东兴挡不住的以外，罗瑞卿是可以突破这一垄断的唯一重要人物，这是决不为他们所容忍的。

这可以通过杨德中的下场看出来。

本来先派到北大任革委会主任的是杨德中，汪东兴、张耀祠认为他不是“自己人”，因为杨德中为“外来户”，他原为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调入的。他们不但想把他调离北大革委会主任的位置，而且赶出 8341 部队，调到咸阳军分区任第五把手。毛泽东死后两年，在汪控制权利时一直不能调回。由此可见，汪对权力控制之严。他们对罗瑞卿的态度可想而知。

据说，总理去世之前，与小平同志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那是总理第一次报病危。

总理这时担心和忧虑的，就是小平同志的安全问题。

小平同志和王洪文等一赶到，总理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不顾一切了，当着王洪文等人的面对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要注意呀，阶级斗争是很残酷的，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小平同志说：“总理不要讲了，这我知道。”

然后总理又转过脸对汪洪文说：“你要好好学习，要不你们是要垮台的。”

以上谈话是总理身边的医护人员讲的，这不但是周对四人帮势力的担心，也是对汪东兴势力的担心。

4、毛毛小姐在大作第 176 页写林彪为什么争当国家主席的原因，第四点是这样写的：“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之间，自‘文革’以来，一直是有分有合，而越到后来就越是分多合少，并且互相齟齬，争权夺利。此次人大如能确定林彪为国家主席，就会为林集团带来与江集团角斗的重要分量。”

对这段论述、论断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虽然毛毛小姐是邓小平的女儿，但是我敢斗胆断言，这决不是邓小平的观点。

在林彪势力存在的时候，林江两支势力从来是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多合少；争国家主席也不是为了增加与江集团角斗的分量。

江集团与林集团的斗争是林彪集团垮台以后江青宣传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不真实，毛泽东不也是这么说的吗？是的，毛是这么说的，我请问，毛说的就是真实的吗？毛这时不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江、林是一伙的，那不是该一起垮台吗？那不等于毛自动宣布“文

革”失败吗，毛会这样做吗？这是毛为了保江集团特意加给他们的说法，为其开脱，也为自己留后路。

但这完全是不真实的。四人帮当时这么说；毛泽东当时这么说；中央党校跑到美国去的阮明在“美国之音”也这么说。

但最不应该这么说的就是邓家。可是毛毛小姐这么说了，这是错的。

为什么我敢如此武断呢，竟敢否定毛毛小姐的观点？

我的理由如下：

1）林彪讲，搞文化革命一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二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是说，一靠毛，二靠我林彪手中的军队。对此，江集团是清楚的，他们自己是没实力的，靠毛不用说了，只有靠林彪的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即使江青本人狂妄、自不量力，别人也不会这么傻。不要忘了，此时康生、陈伯达还在，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决不会产生什么根本性的斗争，更不是什么分多合少。这可以通过康生的态度看出来。林彪一垮台，他再也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大势已去。所以毛说：“康老不出来，我没想到。”但康生想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兵权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怎么会去与林彪争权争利，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的。

通过江青本人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就在林彪垮台前不久，江亲自给林照了一张标准光头读毛选的像登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此刊在林出事以后又匆忙收回，这是使江难以赖账的铁证。林彪出事以后，江青气急败坏，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她一人在颐和园骑着烈马狂奔，进行发泄，不知如何是好。

江青是一个浅薄的女人，极为张扬和外露，但她的行为绝对反映了他们这些人的态度。全国人都知道这件事使毛栽了，江青他们更栽了，他们自己会不知道，他们栽了大跟头。

林彪垮台后毛为此大病一场，可见对他精神打击之大，这不仅是军事政变的刺激，而且是政治上的挫折。

即使他想到对林的警惕，但也没想到林会暗杀他；即使他想处理林，也没想到死的这么惨，而力量又被周一网打尽。

毛都没想到事情如此严重，江青等人又怎么会想到；想都没想到，又怎么会去斗争呢？

2）这两大集团，其实不是两大集团，而是一个大集团，一个小集团。在没拿到全部权力之前，他们再傻也不会不清楚他们是拴在一起的。他们的主要矛盾，是与老的革命家和其他军内势力争权，先是和刘邓斗，再和以周恩来、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为代表的老干部争；这永远是他们的主要斗争目标。

在这一点上他们相当一致，为了这一目标他们总是会在一起的，从来也没有分开过。他们知道，拿不过来这些人的权力，自己就权力有限。所以林彪说：“工交口文化革命没有搞好，等于文化革命没搞。”这就等于说没政权就什么都不算。这当然也是江集团的态度。他们再傻，也不会放着这个目标不打，而去自己斗。放着这个肉不吃，而互相厮杀。江集团不会这么傻，也

没有这个实力，毛也不会让这么做，何况弄不好，周等人还会把邓弄出来，更难办。他们怎么会自斗呢，怎么会分呢？更不用说“分多合少”了。

毛、周、林心中都明白，此时，周代表的力量有着绝不小于林集团的实力，这就是周的行政权力和其他野战军一、二、三野的实力。足以与林、江相抗衡；在舆论处于弱势，在力量决不处于弱势。

毛泽东虽然已经发现、限制这支力量，但绝不是不要这支力量，更不会忽视这支力量，这都是他的力量；更何况他还要用这支力量制衡林彪的力量。毛需要双方的支持，而不是双方的反对。

实际上就是这支力量先使林彪垮台，又使江集团垮台。这不能看作是毛一个人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周的实力。而且毛已经发现，他绝不能单靠四人帮，更不能单靠林彪。

这才是林彪急不可耐想以设国家主席一争政权的原因。

党、政、军林一把抓这是毛所不允许的，毛知道这也办不到。国家此时没有了周、叶、邓这些人一定会大乱，军队大乱，真的混战将不可避免，武汉7·20事件已经使他看到了这支力量的动向和危险的形势，所以他立刻调整了政策，对周等代表的力量让步，而林恰好与之相反，不退而进。毛不允许了。

武汉7·20事件是导致庐山会议的直接原因。

7·20事件给毛的印象太深刻了，他讲了他自建国以后调子最低的一句话。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宽恕陈再道和钟汉华，毛说，“陈再道不是还让我们走了吗？”

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兵谏，台湾认为是周向毛的一次摊牌。

不管怎样，武汉7·20事件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这是一次真正的实力的显示：两百多辆满载解放军的汽车，人人荷枪实弹，冲毛的居所；武汉东湖枪声只要一响，定会大乱，无法收拾。

就是这一次把谢富治和王力打的满脸是血，全身是伤。

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刻否定了林彪，召开了百万人大会，停发了所拍电影《北京支持你》。林彪在天安门所说的：“陈再道出了题目，我们好做文章了。”和“带枪的刘邓路线”被否定了。

毛林的裂痕公开了。

唯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事情发展这么快和林彪出手这么狠而又败得这么惨，这是让毛深感害怕的。

事后，毛对周的依赖加重，猜忌也加深了。

人们会说，怎么从来没有宣传周与林的斗争和周的胜利呢？

很简单，如果那么做，那就不是毛泽东，更不是周恩来了。

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见胜不过众人之知也，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大智者之胜是存于无形与无声之中的。这就是周恩来。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5、毛毛小姐讲到毛为什么始终保留邓的最后一点生机，主要是从毛泽东个人的心胸和态度来说明，这是不够的。邓不倒的重要原因就是二野的实力，这是有据可查的，也是7·20事件陈再道显示的力量。

毛毛书中没提到二野的力量和他们的态度，这是毛毛小姐书中的一个缺陷，也是显得稚嫩的地方。

政治家思考问题的根据，一个是政治目标，二就是实力，这是考虑问题的基础。

政治家每天算的就是形势和力量的对比。

毛与周都不说，邓也不说，就是都在算，算力量的对比和行动的条件与时机：这就是平时所说的“圣人之道不传人”。

对中央各个派系及个人态度，最熟悉和了解的是周恩来。交际最广的也是周，这有他合法的权力。

而最不注意人事关系的就是邓小平，他只是一个劲地干工作，然后独处。

邓只相信毛对他是信任的，自己对毛是绝对忠诚的，自己绝对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其他九一概不管了。这在做人上无可挑剔，但对于政治家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

你不拉拉扯扯，可别人拉拉扯扯，这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我说得可能不对，你们更了解。

谈这些问题，毛毛小姐太年轻，要多听朴方的意见。

以上万言，是我的看法，供毛毛小姐参考。

此致

敬礼

樊立勤

2001年5月12日

注：

1、樊立勤，北京大学生物系1963级学生。文革初期十分活跃，发起主持过多次串联会，后被聂元梓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非法抓捕，私刑拷打，双腿膝盖被钉入竹签致残，但是始终未低头“交待”任何问题。这一点在北大师生中颇得赞赏。

2、杨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员，文革中因反对聂元梓，被投入监狱。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